# 从伦理学视域思索经济学的“课程思政”

# —来自《道德情操论》的启示

毕晶[[1]](#footnote-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北京 100024）

【摘要】鉴于经济学与伦理学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特别是受亚当▪斯密所著《道德情操论》启发，本文试图对经济学的“课程思政”作有益探索，尝试从伦理学角度挖掘经济学专业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并以“同情”和“公正旁观者”理念思索“课程思政”的有效实现路径。

【关键词】伦理学；经济学；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顾名思义，是指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以潜移默化的形式融入到所有课程之中去，期望对学生的思想意识产生正面积极影响，在润物细无声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和世界观，从而达到“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目的。课程思政不同于思政课程，后者指的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课程体系，而前者中的“课程”应该是一种泛化的概念，强调高校育人的所有教学科目和教育活动都应渗透和贯穿思政教育，其特点是以课程为载体、以思政教育为主旨灵魂。这意味着教师需要充分挖掘蕴含在相关学科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并以渗透思政教育的思维来优化课程教学内容和重组教学活动。

经济学作为当今社会的一门“显学”，在大部分高校中均已开设多年。不论是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还是作为其它专业的通识或选修课程，经济学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无疑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经济学这门学科一直没有脱离过涉及伦理问题的政策探索。受以上两部著作启发，特别是读《道德情操论》有感，本文试图从伦理学视域思考经济学的“课程思政”，以期对经济学课程“思政化”的应有之义作出有益探索。

# 一、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联系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于1776年3月问世，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但斯密有生之年的另一本著作——1759年4月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却包含了他本人最想向大众传达的思想。而以上这两部著作，也是斯密有生之年仅有的两部，则分别奠定了他在经济学界和伦理学界的重要地位。这两部书分别被修订了3次和6次，足以可见斯密对《道德情操论》更为重视。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与其它科学一样遵循科学规律进化和发展。但是，经济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追根溯源，伦理学可以说是经济学的源头，以《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为主体的斯密体系其实就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综合。从斯密开始，至马尔萨斯、李嘉图、琼▪罗宾逊夫人、萨伊以及巴师夏等经济学家均从各种角度对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紧密联系作出过肯定判断。然而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过于强调经济学的科学化，在强化计算功能的同时与伦理学日渐疏离。20世纪中后期，伴随财富增长人类自身生存条件不断恶化，思想家们开始了经济与伦理、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深刻反思，并致力于经济学与伦理学有机综合的辩证复归。简言之，二者的关系表现在可将《国富论》看作是《道德情操论》在社会经济生活和个人经济行为领域研究的延伸与拓展；经济学亦可通过更多更明确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而更具解释力。

# 二、《道德情操论》中的思政教育元素

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自由市场经济进行了深入分析，强调了出于“自利”的个人如何推动国民财富的有序增长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并以“看不见的手”作为对自由竞争市场均衡理论及其经济增长路径的说明，为现代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学原理的分析框架。在这部划时代巨著中，斯密所阐述的个人所具有的“自利”特征引发了无数争议，其中不乏贬损之辞。

正是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阐明：具有利己本性的“经济人”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特别是通过约束自私的情感和行为，为建立有行为规范的社会作出贡献，从而能够为他人带来福利。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释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体系，正是以《道德情操论》为前提。可见，深入挖掘经济学课程中所包含的思政教育元素，《道德情操论》能够提供更直接鲜明的视角，本文仅选取以下三个例子略作说明。

## （一）“自利”概念辨析

《国富论》中阐释的古典经济理论对经济科学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自利人”仍然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对“利己”这一概念或思想的理解，是理解斯密道德哲学的关键所在，也是经济学课程教师在备课以及讲课过程中需要向学生阐释的重点内容。

18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个时期也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开始发挥巨大作用的重要历史时期。此时，技术改进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基础，工业创新又带动了农业机械和生产方法向前发展，经济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种社会发展的进程是成千上万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努力的结果。根据斯密曾游历欧洲大陆近3年之久的观察，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是符合人性和历史规律的更合理安排。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斯密的观点当然是从维护资产阶级的地位而出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资产阶级也的确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斯密的这句话耳熟能详，所阐述的其实就是市场经济运行原理。在斯密看来，人们从个人利益出发进行经济活动，能够自然而然的达到社会繁荣。事实上，斯密所阐述的结果只是一种理论逻辑推理，社会繁荣的实现需要多种条件的复合，如法治和规则。此时，“看得见的手”即政府的职能就要发挥作用了。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即资源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但我们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即：“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据此，教师可以引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40多年的现实案例，说明中国地方政府的巨大贡献；亦可在阐释市场价格机制重要作用的基础之上，说明市场价格信号的真实反映必须有赖于充分市场化的竞争过程，引导学生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充分市场化的深入理解。

与此同时，教师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自利”这一概念的中性特点，深入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尊重并保护个人的自利动机，但“自利”不等于“自私”。个人通过努力和奋斗合理改善物质条件，不断实现更高层次的理想和愿望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原理，应受到认同、鼓励和保护。我国计划经济年代的“大锅饭”体制失败就证明了这个道理。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由此告诫全体党员干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仅以上述内容为例，在辨析“自利”这一概念之时，教师不仅可以引入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语录，更可以加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释和理解。因为，“自利”属于人的本性，而宏观公平环境的建立不仅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也需要美好道德环境的营造。

## （二）“看不见的手”背后隐喻

“看不见的手”所蕴含的自由市场理论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合理和迫切要求。斯密认为，也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经济达到了“自然平衡”。《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均是为了解决“看不见的手”这一问题，探究了在个人主义社会里实现社会秩序的基本原理，即“看不见的手”是一种从利己出发从而使私利与公益协调的力量。这种力量隐喻的是一种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的力量。但“看不见的手”所具有的伦理缺陷，无疑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发挥重要职能。

在我国，“看不见的手”被看成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体制和道德伦理规范，如取利有道、诚信、平等、责任、公正等。教师顺势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认真思考弘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教师应阐明：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来解决失衡和复苏，不仅周期长、代价大，还会引发社会动荡与混乱，目前在西方某些国家由于疫情所引发的混乱情形比比皆是。协调与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各自作用，这不仅是西方经济学要回答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教师加入思政教育内容，指出中国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正确做法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不顾本国实际完全照搬，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应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实际国情为经济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 （三）“正义、仁慈、责任感以及谨慎”品德阐释

斯密从人类基本道德情感出发，论证了正义、仁慈、责任感以及谨慎等基本的德行，这些论证暗示：人类社会的和谐、市场的健康运行都离不开人的良心和同情心等人类基本道德情感的支撑。他指出，“正义和其他所有社会美德之间的明显区别：我们感到自己按照正义行事，会比按照友谊、仁慈或慷慨行事收到更为严格的约束”，“个人的身体状况、财富、地位和名誉，被认为是他此生舒适和幸福所依赖的主要对象，对它们的关心，被看成是通常称为谨慎的那种美德的合宜职责”，“对自己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谨慎的美德；对别人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正义和仁慈的美德”，等等，他试图说明：只有把利己的市场动机立于同情心和正义感之上，市场的无形之手才能真正发挥其正能量，才能真正发挥其调节市场达到自然均衡的作用。教师在此处可重点向学生阐明：市场自利的本性与市场主体诚信利他的人性有机统一，才能造就成熟而健康的市场。

斯密进一步指出：“那些心里从来不能容纳仁慈感情的人，也不能得到其同胞的感情，而只能像生活在广漠的沙漠中那样生活在一个无人关心或问候的社会之中”，“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地把尊重那些重要的行为准则铭记在心，人类社会就会崩溃”，等等。通过阐释人类社会中具有利己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情感或行为，斯密说明了如何建立一个有确定行为准则的社会。然而，此过程也明显反映出斯密所具有的阶级局限性，即将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归结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教师可以批判的态度向学生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支撑点应当是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领导人或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提出的已经实践检验过的重大经济理论观点，这些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实践指南，这些具有高度概括性和理论抽象性的真理。比如，教师可引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等语录，指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实现“强起来”的行动指南，同时告诫学生谨记：只有以理论创新指导伟大实践，我们的党和国家才能够永立时代潮头、永葆青春活力。

# 三、“同情”在教学方法与手段中的应用

《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同情”指的是同情共感，是能够感受到对方情绪的一种天然能力；“同情”也是这部著作所阐述思想的基本基调，是斯密整个社会科学演绎逻辑的核心。在斯密看来，人与其它生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同感”能力，即他对别人的心理、情感、行为的感受和理解能力。自利的情感，归根到底，也是人类对自己利益的一种同感而已。

斯密认为，社会秩序是否具有可靠的内生性、合宜性和稳定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人类仅仅依靠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和合宜的互动，就已经可以形成一个稳定合理的秩序。同情心作为道德的基础与出发点，通过想象感受他人的情感，以行为是否合宜为道德评判的标准，以良心为高级法庭用来审判行为，倡导以同情为基础的四种美德，即仁慈、正义、谨慎、自制。因此，以同情立论，斯密认为道德产生于人与人的社会交流、互动和博弈过程中，将道德败坏的原因归结为人们同情、附和快乐、幸运、喜悦的倾向，批判了不顾一切地追求优越的处境、盲目崇拜和模仿富人及大人物的行为，说明在同情机制下，社会风尚与环境既可以引导人与一般标准相一致，做出各种美德的行为，也可以打破这个标准，使道德败坏。“同情与其说是因为看到对方的激情而产生的，不如说是因为看到激发这种激情的境况而产生的”，“人们都承认，是否赞同别人的意见不过是说它们同自己的意见是否一致”，藉此启发学生的同情共感，引导学生的情绪认同，使学生真正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内涵并内化为自己的情感认同，教师需要在培养学生“同情”共感能力上下功夫。伦理学上的引导比单纯的经济学知识灌输更能启发学生的自觉认同，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达到课程思政的主要目的，即培养爱国主义情怀的当代大学生，从而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高层次教学目的。

依据斯密的观点：人的情感总是与行为密切联系并依据于一定的行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注意与学生的情感互动交流必不可少。尤其是，“课程思政”要求专业课教师在讲授课程的过程中渗透对学生的思政教育，在情感上引发学生的“同情同感”不可或缺。“赞同别人的意见就是采纳它们， 采纳它们就是赞同它们”，“人们都承认，是否赞同别人的意见不过是说它们同自己的意见是否一致”，利己心与同情心是人类行为的两个最基本动机，且相生相伴。教师可以借助学生心中必然存在的“同情心”，尽可能借助恰当的教学手段引发学生对相关联思政内容产生共鸣，以起到更好的教育和教学效果。

# 四、“公正旁观者”角度的考核方式变革

研究斯密问题的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国富论》属于经济学中的理论经济学；《道德情操论》属于哲学中的伦理学，两者具有较大差距。而在斯密的年代，两者都是“道德哲学”这一门大学科下的分支学科。在斯密所构建的道德坐标体系中，纵轴是同情，作为构建道德的必要元素；横轴则是合宜性，或者合宜感，作为把握道德的重要尺度，由“公正的旁观者”所掌握。

“公正旁观者”范式正是以人人都具有的“同情”能力为基础构建。“公正旁观者”理念亦可用于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对于考核方式的变革思索。对于一门专业课程的考核方式是否公平、合理，显性反映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掌握以及对学生的思政教育效果，“公正旁观者”作用不可小觑。

“最普通的教育教导我们在所有重大的场合要按照介于自己和他人之间的某种公正的原则行事，甚至平常的世界贸易也可调整我们行为的原则，使它们具备某种程度的合宜性”，合宜就是合适、恰当和具有正确性。“我们对他人行为不断的观察会不知不觉地引导我们为自己订立了关于什么事情适宜和应该做或什么事情不适宜或不应该做的某些一般准则”，通过“公正旁观者”的作用，教师在制定能够体现思政教育成效的考核方式时，可尝试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思索如何使考核方式更为公平公正，并能够同时反映对学生专业修养以及思政素养的考察，如加大平时成绩占比、增加课外实践考核内容，甚至鼓励学生参与考核改革以集思广益寻求最佳方式。总体上，对经济学“课程思政”的成效考察在很大程度上以学生的思政教育效果为准，对学生的综合考察应涵盖是否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主观性内容。

# 结语

虽然不可否认斯密在经济学界的至高地位，也深受其《道德情操论》启发，但若一味地以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高校经济学课程主流，则不利于当代大学生深刻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更不利于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与塑造。以上状况的改变一方面亟需整套中国特色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另一方面则是依赖于经济学的“课程思政”建设。可见，经济学“课程思政”是当前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使命。深入挖掘经济学的思政教育元素具有较强的现实与理论意义，有助于相关高校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以及“课程思政”作为一个更宏观理论概念的推广和完善。相关教师需要结合对于经济学“课程思政”涵义、理念和问题的研究，积极探索，勇于实践，敢于创新，在实现“传道授业”同时加强“立德树人”意识和做法，认真钻研和改善该学科的思政育人成效，为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做出贡献。

#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M]. 蒋自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15； 99；107； 169；200-201；277；343.
2. 亚当▪斯密. 国富论[M]. 郭大力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28.
3. 罗卫东. 理解亚当斯密：伦理学的视角[J]. 学术月刊，2008（10）：78-85.
4. 向德鸿. “斯密问题”的由来、争论及再解释[J]. 经济研究导刊，2016（26）：6-8.
5.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6.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7-01（1）.
7. 王科.《道德情操论》对社会主义市场伦理建设的启示[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9）：43-44；79
8. 丹尼尔. 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39.
9. 薛为昶. 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离分与复归[D]. 东南大学，2005.
10. 方福前. 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创建[J]. 教学与研究，2020(06):29-40.

A Study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Economics 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Enlightenment from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BI Jing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the inseparable na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economics and ethics, especially inspired by reading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written by Adam Smith,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with the purpose of trying to find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Economics and thinking over an effective realiza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he concepts of “sympathy” and “just bystander”.

**Key words**: ethics; Economic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1. 收稿日期：2021年02月18日

   作者简介：毕晶（1978-），女，山西阳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基金项目：2020年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建思政（德育）研究重点课题（11171080）。 [↑](#footnote-ref-0)